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拓展及其世界意义

张文木

60年来,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世界形势变化很多也很大,一些矛盾解决了,另外一些矛盾又产生了,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矛盾仍是那个古老的资源与发展的悖论。国家安全问题的产生正是基于这个悖论。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和探讨。

一、世界基本矛盾与中国国家安全观的逻辑前提

资源的有限性与发展的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社会自始至终都要面临的基本矛盾,也是国家冲突的总根源。20世纪80年代,亚太国家整体性地转入市场经济快车道,使世界经济发展必需的资源问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更加突出。有人说,科技进步将解决资源稀缺问题,可我们发现,与几千年前相比,现在人们的饮食和过去没有本质区别,科技进步不仅没有解决粮食和水的无限供给问题,相反还使人类生存离不开的这些基本资源更加稀缺了。当前的国际政治学被附加的无效元素太多,要返朴归真。讨论问题应多用减法和约分的方法,减约到最后剩下的就是不能再减约的真问题,即馒头和水。找到真问题,就找到了中国国家安全的逻辑前提。迄今为止,人类实践没有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①“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

*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邮编:100191)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页。

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

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②人类之初就面临的资源与发展间的矛盾,在人类进入“发展才是硬道理”^③的市场经济快车道后就变得更加突出了。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国际政治中的对立是绝对的,而合作——尽管值得争取——则是相对的。理论要经过经验的过滤,一些学者的研究流于空谈,这是需要着力避免的,尤其是研究国家安全问题,不能书生气太重。

二、从生存到发展:中国国家安全观新拓展

国家安全观的拓展是由国家面临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战略压力,以及由此决定的战略任务的变化决定的,理解不同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观应当从不同时期的国家所面临的战略任务入手。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国家安全任务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保生存,具体说就是反分裂、保主权。这个阶段主要是在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任务开始从保生存向保发展过渡。党的十六大后,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使中国大规模地卷入世界事务。此后,在世界范围保护中国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获得的经济政治利益便成了国家安全任务的重心。此时的国家安全观已与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发展就是安全,而保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就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动力。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政治还处于苏美英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阴影之下。^④ 1945 年,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紧接着就是斯大林和马歇尔对中国内战的“调停”,调停的实质是落实苏美达成的分裂中国的《雅尔塔协定》。在南面,马歇尔劝说蒋介石不要北上;在北面,斯大林劝说毛泽东不要南下。这实质上就是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9 页。

② 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 页。

③ “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7 页。

④ 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1 日,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第二次会议。在中国问题上,为了保证苏联对日作战,罗斯福、丘吉尔背着中国与斯大林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亦称《雅尔塔协定》),协定在中国不知晓的情况下牺牲中国利益,规定战后:“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以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迫使中国认可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利益的条款以保证苏联参战。参阅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68 页。

中国保持在事实上的南北分裂状态之中。蒋介石因不听马歇尔不许北进的“劝告”为李宗仁所取代。1949年初,李宗仁上台后“和谈”的要害在于变相落实本质上在于分裂中国的《雅尔塔协定》,置中国于事实上的“南北朝”形势之中,若果真如此,今天的“台海两岸”分离就会成为“长江两岸”的分裂,中华民族由此也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点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说得很清楚,也很悔罪,他说:“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得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①

其实,李宗仁在写这段忏悔时并不知道,当时美苏就是这么做的,他只不过是充当了美苏分裂中国的马前卒罢了。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排除万难,挥师渡江南下,终将中国基本归于一统。

尽管如此,还不能说中国已完成了反分裂保主权的历史任务。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斯大林还在要求中国关外即从东三省到新疆的势力范围并坚持外蒙独立,这是他在《雅尔塔协定》中获得并为蒋介石政权承认了的。

1953年朝鲜战争后,中苏关系中还残留着《雅尔塔协定》的余音。毛泽东为此与赫鲁晓夫进行了坚决地斗争。50年代下半叶,赫鲁晓夫在交还大连旅顺港后又要与美国进行“海军合作社”,向中国提议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使毛泽东联想起斯大林曾经向中国提出的对旅顺大连港的无理要求。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表示“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批评赫鲁晓夫“现在搞斯大林的东西”。^②

此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中国保主权、反分裂的斗争日益升级。1962年又是一个高潮:当时国内饥荒,在北方,苏联鼓励的新疆伊犁居民大批向苏联境内外逃;在东南,退守在台湾的蒋介石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在西南,则是印度不断蚕食中

^①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②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

国领土。这三个事件在三个方向在同年一并爆发,这时的中国人真是感受到了“万花纷谢一时稀”的艰难困境。为此,中国被迫于年底实行对印自卫反击战,并于两年后即1964年底成功进行了核试验。这两项强有力的外交举动使中国外交大体渡过了当时危险的形势。

20世纪60年代,就在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同时,苏联又在中国北方大兵压境,中国安全面临着更严重的威胁,这迫使中国全面备战。毛泽东担心美苏南北合击,为此搞“大三线”建设。1964年7月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①8月初美国在越南策划“北部湾事件”,将在越南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这时,毛泽东非常担心出现两面作战的危险。1965年4月28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说:“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②

尽管毛泽东认真在做“美国和苏联共同对中国开战”的准备,但毛泽东对当时复杂的矛盾有着清醒地判断,开始准备与美国改善关系。他认为美苏争霸是当时中苏美三角矛盾中的主要矛盾。1964年1月14日,在回答国际友人提出的“从长期来看,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的问题时,毛泽东曾谈到:“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他们也看不起你们和其他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同志,认为你们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只会吵吵闹闹,在《北京周报》或广播电台工作而已。他们看不起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有利。”^③当时陈毅也说:“中美关系,保留一定距离比较好,现在还没有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美国人确实完全输光,对他很不利了,不解决不行了,那时水到渠成,可以解决。”^④这说明毛泽东在做两线作战最坏打算的同时,也在尽力避免两线作战。1965年,毛泽东已看出“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⑤,国力已超出其极限,其结果必然是美国被“十个手指按跳蚤”^⑥的疲惫所拖垮。毛泽东接着谈到中美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是会

① 转引自杨奎松:《“反帝反修”的历史困惑》,《领导者》2009年第4期,第116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③ 毛泽东:《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1964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3页。

④ 《陈毅同志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1961年3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48/1/40/39。转引自杨奎松:《“反帝反修”的历史困惑》,《领导者》2009年第4期,第116页。

⑤ 毛泽东:《赫鲁晓夫日子不好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60页。

⑥ 毛泽东国际友人:“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说,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毛泽东:《赫鲁晓夫日子不好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4页。

接近起来的。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①在这次谈话前几个月,毛泽东谈到中美关系时说得更具体,他预计“总有一天两国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②这说明,毛泽东估计到美国将被苏联的莽撞拖垮,中国可以坐等翻牌的时机。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当时徘徊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尼克松看明白了。1972年2月20日,他对记者说: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③此话同时也在暗讽苏联勃列日涅夫缺乏哲学头脑,因而是无法与之交流的人——这让人联想起1939年一直想与苏联结盟,但又因其条件过于琐碎和没有哲学头脑而失去斯大林信任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珍宝岛事件后,就在苏联搬起石头要砸向中国的时候,中美迅速结盟,这使中国外交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美国和苏联共同对中国开战”的危险,也使美国摆脱了危机。

当时的“大三线”建设是基于可能出现的美苏南北同时夹击的安全压力而提出的,现在很难说“大三线”政策是对还是错。有很多危险只有准备了才能避免,也就不能因为危险没有发生就说此前的准备是错的。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国家安全观始终是与毛泽东特有的全球视角相一致的。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④但这个理论还是以自保为主,当时中国声援的战线拉得很远,但真正出手的地方却很近。毛泽东说,世界上“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但只是放空炮,喊一喊,不像勃列日涅夫真援助、真出兵。^⑤毛泽东基本上只是经济援助,不真出兵。

毛泽东生前基本完成了新中国生存阶段的保主权、反分裂的任务,并通过打开中美关系的坚冰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作好了前期铺垫。

中美建交后,中国人的国家安全观念开始从生存安全转向发展安全,从国内转向世界。这个转变是先由经济发展带动的。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使人们的观念也同时向世界伸展。当时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① 毛泽东:《同斯诺谈国际问题》(1965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57页。

② 毛泽东:《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1964年6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33页。

③ 转引自熊向辉:《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

④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页。

⑤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告诉斯诺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毛泽东:《同斯诺谈国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58页。

思想,^①就是从发展的视角阐发的。这不仅是一个针对教育界的认识,也是中国国际观的重要转变,它指明了“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趋势。发展本身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②因而决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概念。中国的发展也是这样,它必然也是一个能动地参与和改造世界过程。在此基础上,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③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台湾问题与国家的生存即主权安全联系在一起,而在邓小平时期,鉴于台湾问题已与中国海权的拓展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海权问题又与中国发展联系在一起,因而这时的台湾问题已成了中国发展绕不过的瓶颈。

邓小平之后的党的十四、十五大期间,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其在世界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至今已有近1/2的经济利益依托海外,而对这部分经济利益的海外安全保障则基本上处于守势且未纳入中国国家安全的视野。但随着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进一步加深,保护中国海外的经济利益成了中国国家安全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新的实践条件又使得中国国家安全观念发生革命性的拓展。这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思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④“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⑤胡锦涛同志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想,是对邓小平“三个面向”认识的深化和具体落实。“两个大局”是一个真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理论,由此带来的中国安全观也相应发生变化:它将中国主权中的自卫权的观

① 《为景山学校题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页。

② “世界历史”,是黑格尔提出的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概念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9页。

③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0页。

④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⑤ 同上书,第16页。

念从国内引伸到国际,不仅注重“边界安全”,而且还更注重“安全边界”,^①不仅注重领土和主权安全,同时还更注重广泛而世界的利益安全。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想是我党新时期国家安全观的新视野,它将中国的前途命运紧紧地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相联系,它使中国的国家安全观有了真正的全球眼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今天中国已渐成为是世界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而现在我们是胸怀祖国、胸怀世界,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这告诉国人,中国现代化不能仅仅把自己的事办好就行了,必须同时要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动力和轮子的运转。如果没有海外资源和市场的支撑,国内经济发展也就会受到限制。2007年11月,令计划同志在《党建研究》发表文章指出:“综观全球,国际形势正在向各国关系日益紧密、互动日益增强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正在演化成一个‘地球村’,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闭关自守、在世界潮流之外独立发展。只有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起来,使本国的发展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才能从世界发展大势中赢得更多的机遇,获得更广的空间,取得更大的优势。”^②文章将中国的资源需求问题纳入全球视野,提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利用资源,通过互利互惠获得国际资源要素,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撑。”^③1987年,党的十三大文件中,我们只是注意到在国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问题,^④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注意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利用资源”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变化,必然引起中国国家安全观以及安全政策的相应调整,即在以往支撑国家发展的国内“支柱”外,又加上了另一个国际“支柱”。现在,中国在海外成立了数量众多的孔子学院,对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说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⑤在外交上,中国领导人出国

① “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是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可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领土边界安全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对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国家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及其可达范围。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国家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边界安全系数与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线,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参见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② 令计划:《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建研究》2007年第11期。

③ 同上。

④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年10月25日, <http://cpc.people.com.cn/CB/64162/64168/64566/65447/4526368.html>。

⑤ 我注意到,在印度的一些重要城市,美国都办了它的图书馆。

时也重视海外工作人员和我们的商人,一旦出现问题,中国使馆外交人员被要求到第一线进行处理。其原因在于,在国际“大局”中,海外华人活动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不可缺少的生力军,是国内“大局”的重要支持者。

中国经济及其利润的海外延伸使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利益之所在,对国家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新世纪中国的国家安全已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已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已不仅仅建立在本土安全之上,而是建立由本土辐射到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已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想使中国的国家安全观真正进入发展的轨道。

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的一致性,内部安全需要通过外部安全的解决来带动,这是近现代的英美国家对国家安全的基础观念。马克思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

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从而“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的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中国安全问题已与利益而非仅仅是领土联系在一起。利益范围即国家安全涉及的范围,这是近代以来英美国家安全观的通则。过去,我们不理解英美国家的外交政策,现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投资和资产,这样中国就不能不考虑当地的事情。我们会发现,英美外交政策中也体现了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些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外交不可逾越的规律。既然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中国国家安全观念就需要有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飞跃。

三、中国国家安全观对未来世界治理的贡献

当今世界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无论如何离不开世界治理。而在任何时代,世界治理都不可能基于所有国家权利的绝对平等。事实上,在国际社会中,只有比较强大的国家才能对世界担起更多的责任,并在事实上获得更多的权力。

近代以降,世界治理已经经历了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英国模式,即世界殖民模式。真正开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使治理从国家治理转向世界治理的是英国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使一国经济转变为世界经济,与此相应,英国也就担当起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治理任务并创造出相应的世界治理模式——世界殖民模式,这是一种直接军事占领掠夺并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役的模式,比较残酷。这种模式从英国工业革命后保持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最终为战后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所吞没。

第二种模式是美国模式,这是一种对民族自决权至少保持形式尊重的模式。与英法模式相比,相对英国模式而言,美国模式文明了许多,它摒弃了对殖民地直接掠夺的方式,而采用一种间接经济和政治渗透与控制的方式。自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治理主导权后,这种模式保持至今。但这种资本优先的模式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世界经济的畸形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南北严重对立。

客观地说,英国模式和随之而来的美国模式,对世界治理都有相当的贡献,比如英国人对世界市场相互联系的认识,美国人提出并推动的关于民族自决的理论及其给世界带来的进步等;同时,这些模式也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灾难,但相比较而言,美国人的世界治理模式还是进步了许多: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还是得到了至少也是形式上的实现。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提到的南北差距日益扩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英美国家不仅始终没有解决,而且有增无减的贫富差距的现实仍是当前人类世界治理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难题。邓小平同志看出问题的要害。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曾对日本朋友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是要受到限制的。”^①无疑,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06页。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上述新变化对未来世界治理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风水轮流转,也是认识大国间治理世界主导权更替的历史线索。中世纪时,中国在世界占尽风流,后来世界运势转到欧洲并驻足于英国。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世界文明中心完全转向西方,20世纪世界运势从英国转向美国。现在看来,大国天命有从美国继续西渐,再次降临中国的趋势。

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①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2008年,世界范围发生了经济危机,在摆脱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样,中国也向世界表达了其世界治理理念。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主张“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②这抓住了当前世界治理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和事关当代世界命运和前途的主要矛盾。针对这个矛盾,中国的主张将为其在更大的范围内走向世界舞台并做出更大的贡献提供理论支撑。由此也可预见,未来的世界治理理论及其模式,将会自英国模式、美国模式之后发生革命性的即中国式的变化。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国家安全观的上述拓展性的变化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还会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③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与世界人民共命运的过程,中国的“东方经验”(如“止戈为武”、“和为贵”及孙子的“全城为上,破国次之”的经验)将使我们谨遵毛泽东说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原则。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殷鉴不远,古罗马人得鱼忘筌,他们得到地中海之后,也就失去欧洲大陆。历史表明,只有与国力相匹配的国家目标,才是可实施和可持续的。只有守成性的中国发展,才是可持续的。这就是中国国家安全观新拓展留给世界的意义,尽管它还处在初级阶段,但给世界带来的前景将是非常光明的。

^①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单行本),第47页。